

樹繞青蘿溪
洞深機洞仙
居處上層不
藉如椽開張
飯玉山早見
風如茶
己卯嘉月
滿庭

韩成武 张志民

杜甫诗全译



杜甫

韩成武

张志民

杜甫诗全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杜甫诗全译
韩成武 张志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42印张 1,015,000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66.00元

ISBN 7-202-02132-3/1·475

前 言

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正月，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享年五十九岁。其家族世代奉儒守官。先世居于杜陵（今西安市东南），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著名学者，封当阳县侯。十世祖杜逊在东晋初年迁到襄阳（今湖北襄樊），任魏兴太守。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今属河南）县令，遂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外祖父的母亲是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外公家姓崔，是清河大族。

公元712年正月（这年八月，玄宗即位），杜甫诞生于黄河南岸巩县城东的瑶湾村。在他尚未记事时，母亲崔氏便因病离世，从此他被寄养在洛阳仁风里的二姑家，受到姑母精心的照护。童年的岁月烂漫而朦胧，许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无可挽救地湮灭于记忆的长河里，留下的最初记忆是六岁时在偃城（今属河南）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杜甫晚年回忆当时公孙大娘的舞姿，说她忽而自空而落，光彩夺目，如同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腾，如同一群天帝驾着蛟龙飞翔；她上场时神情端庄，如同雷霆初止，天地一片肃穆；她收舞时英姿卓立，如同江海停止翻腾，凝聚着清冷的光辉。这说明幼年的杜甫就已对艺术有了较强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七岁时，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首诗

便是歌咏象征着王朝兴盛的祥瑞之鸟——凤凰。这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生出对国家富强的期盼。这似乎是一个预兆，兆示出杜甫终生心系国家命运的那份苦恋的历程。练习作诗的同时，杜甫还学写大字，很勤奋，到九岁时已写满了一口袋的习作。十四五岁时，他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经常出入于文人荟萃的场所，与当时的文坛名流交往。这期间，他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崔涤任秘书监，也常邀杜甫来家中做客。

唐代知识分子不囿于书斋生活，读书之外喜好游历天下。特别是盛唐时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然成为时尚。杜甫从二十岁起到三十四岁止，基本上是在漫游中度过的。第一次是游吴越，开元十九年（731），他从洛阳出发经水路抵江宁（今南京），在秦淮河北岸的瓦官寺，他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晋代名画家顾恺之的壁画，兴奋异常。然后来到苏州，凭吊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游览了虎丘山中的剑池和城西南的长洲苑及城西北的吴太伯庙。又南渡钱塘江，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凭吊了勾践庙和秦始皇留在那里的古迹。会稽城南的鉴湖，以及那里的剡溪、天姥山，秀异的山光水色，使他大开眼界，徜徉不已。

开元二十三年（735），他二十四岁，从吴越回到巩县，准备参加这年在东都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的文才可以匹敌屈原、贾谊，可以俯视曹植、刘桢。结果却未能考取，但也不以为意。第二年又去漫游齐赵（今山东和河北南部）。这期间，他结识了终生挚友苏源明。二人曾于春日登临邯郸赵王丛台，缅怀古人，翘首高歌。又在冬日射猎于齐景公畋猎过的青丘（今山东益都附近），在皂枌林中、云霄网上呼鹰逐兽。父亲杜闲此时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杜甫前往探亲时，登上兖州城楼，感慨宇宙悠悠，人生短促。初睹泰山雄姿，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写出名篇《望岳》，抒发了青年诗人的凌云壮志和阔大胸怀。

这期间，他还游历了任城（今山东济宁），与任城主簿交游。又与已上人、张隐士来往，赞美他们的幽雅居处和淡泊情怀。

开元二十九年（741），他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东面、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建造一座“土室”（即窑洞），名曰“陆浑庄”。首阳山有他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建造土室是为了便于祭奠祖先，在所作《祭当阳君文》中，他表示要以杜预为楷模，建功于当世。大约就在这一年，他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成婚。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从天宝元年（742）到天宝三载（744），杜甫居洛阳。其间曾与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人有过交往，拜访过初唐诗人宋之问遗留的山庄别业。天宝三载三月，翰林学士李白因傲岸不羁得罪了权贵，被玄宗赐金放还，路过洛阳时，与杜甫初次相逢，二人一见如故，遂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诗人高适，三人畅游梁孝王留下的梁园，登临吹台，环顾大野，思念古人，对当时玄宗崇尚武功、频动开边战争表示忧虑。不久，高适离开梁宋南游楚地，李杜二人渡过黄河去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不料华盖君已死，只得失望而归。后于天宝四载（745）初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结识了当时著名诗人、书法家李邕，深得这位文坛前辈的赏识（两年之后，李邕被奸相李林甫冤杀，杜甫深为痛愤，直到晚年仍作诗怀念这位忘年之交）。杜甫之弟杜颖当时任临邑（今属山东）主簿，临邑在济南北部百余里，杜甫前往探视，住了一段时间，复还济南，又奔任城，寻访住家在那里的李白，二人相携游览，感情亲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们一同走访范居士和元逸人，还有炼丹的董先生，经过一段盘桓，道术未能学成，杜甫即准备前往长安，走入仕途，以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李白则欲游江东，继续过其洒脱的生活。于是两位诗友分手，竟终生未能再见。彼此间无限的

崇仰与深情的怀念，凝结在一首首赠答诗中。十几年的漫游生活，开阔了生活视野，祖国的名山大川，盛唐的繁荣景象，不但极大地鼓舞起他的从政愿望和爱国之心，而且奠定了他的博大、浩荡的诗歌格调。

天宝五载（746），杜甫三十五岁，怀着远大的政治理想来长安求仕。然而，此时的玄宗已非早年的那位励精图治的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相李林甫，生活极端腐化。但杜甫对玄宗仍存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轨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人生加深认识，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天宝六载（747），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玄宗诏令天下之士通一艺以上者皆到京师就选，杜甫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这次考试。此时正值李林甫频频制造冤案之际，他害怕应试者在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便施展阴谋诡计，把考生全部落选。这使杜甫痛心而且愤慨，但入仕的志向仍未动摇。天宝七载（748），他向尚书左丞韦济投诗，请他给予援引：“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此后，又给汝阳王李琎、京兆尹鲜于仲通、左丞相韦见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等人赠诗，表达了强烈的入仕心愿。与此同时，他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天宝十载（751），投献三大礼赋，被玄宗看中，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命宰相考他的文章。集贤院的学士们都来监考，一时间声名突然显赫。但考试结果，仅获得个“参列选序”的资格，使他大失所望。此后，又献《封西岳赋》、《雕赋》，仍不见有任何进展。这期间，杜甫的生活异常艰难。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已而向亲友乞求救济，有时去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长安市上出售以糊口，

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他尝到了挨饿的滋味。生活教育了他，他开始用深邃的眼睛透视现实，思想感情逐渐转移到贫苦百姓的一边。

天宝十载（751），他创作了名篇《兵车行》，揭示唐王朝征伐南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首光辉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杜诗的一座里程碑。同时期创作的《前出塞九首》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唐玄宗的开边政策上。天宝十二载（753），他创作《丽人行》，批判了宰相杨国忠和三位国夫人的腐化堕落的生活。天宝十三载（754），作《秋雨叹三首》，描写六十余天的秋雨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揭露杨国忠封锁灾情的卑鄙用心。他经常与广文馆博士、穷朋友郑虔相聚，借酒浇愁，长歌当哭，痛斥世道之不平。

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被授官河西县尉，杜甫拒而不受，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宿卫，杜甫为生活所迫，只好就任。至此终于结束了四十四年的布衣生活。小小的八品官与他的扶世济民的大志未免相距太远。十年困居生活的最大成果是杜甫从一个“裘马颇清狂”的官宦子弟改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得官后的这年十一月，杜甫自京都前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作《咏怀五百字》。这首五言长诗充满郁勃不平之气，忧国家之将覆，哀民生之凋敝，叹正当理想之无由实现，通篇闪烁着批判现实的思想光辉。

就在杜甫与家人团聚之际，安禄山起兵范阳。唐政府毫无防备，仅三十三天，东都洛阳便陷入叛军手中。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难当头，杜甫告别家人，赶回长安供职。到这年夏天，叛军大举西进，逼近潼关。奉先受到威胁，杜甫遂由长安赶回奉先，带着家属向北逃至白水（今属陕西），投靠

在白水作县尉的舅舅。白水距潼关约四百里，杜甫登高远眺潼关，写诗遥嘱守将哥舒翰，切勿轻易开关迎敌。但因宰相杨国忠的逼迫，哥舒翰不得已而出战，结果全军溃败，潼关陷落，关中随即大乱，君臣百姓纷纷逃亡。杜甫带着妻儿离开白水，继续北逃，在杂乱的逃难人群中险些丧命。一家人终日在风雨泥泞中跋涉，苦不堪言。经过三川县（故址在今陕西富县南）时，又遇到山洪暴发，天灾人祸，几乎将他陷于绝境。最后来到交通闭塞的鄜州（今陕西富县），将家属安置在鄜州西北三十里处的羌村，这里群山环耸，民风古朴，易于存身。

与此同时，玄宗亦仓皇西逃。途经马嵬驿时，护驾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发动兵谏，铲除了杨国忠、杨贵妃一伙。玄宗留下太子李亨主持抗敌。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这就是唐肃宗，年号改为“至德”。一个月后，肃宗派使者到成都见玄宗，玄宗派扈臣韦见素、房琯、崔涣、贾至等，持传国宝、玉册前往灵武传位。

八月初，杜甫在羌村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想到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便离开羌村，前往灵武投奔肃宗，不料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沦陷的长安。由于官小身微，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这使他有可能目睹叛军践踏下的长安惨像和听闻战局进展情况，写出《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春望》、《月夜》等一批忧国思家的优秀诗篇。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把临时政府移到凤翔（今属陕西），向长安逼近了一大步。杜甫得知后异常兴奋，遂准备投奔凤翔。经过周密的筹划，终于在四月的一天，从长安西城金光门潜逃而出。当时，叛军正在长安西郊屯防，他不敢走大道，也不复抱有生存的希望，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冒死一试。当他侥幸到达凤翔时，已是衣衫褴褛、瘦无人形了。五月十六日，肃宗下达诰

文，授杜甫左拾遗官职。上任伊始，便受挫折。宰相房琯本为玄宗扈臣，曾在成都为玄宗出谋以诸王分镇天下的抗敌策略。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将此事告知肃宗，引起肃宗对房琯的敌视，遂借口房琯门客董庭兰受贿事，将其相职罢免。杜甫自思身为谏官，于此冤案不能缄口，遂上疏为房琯辩护，陈辞颇为慷慨，结果触怒肃宗，遭到审讯。幸得新任宰相张镐等人的营救，方免刑罚。肃宗无奈，只得让杜甫官复原职。杜甫虽遭打击，却并不消沉，仍旧为收复两京而努力工作。他曾表荐岑参作了右补阙，又曾写诗送别去外地防务的长孙九侍御、从弟杜亚、郭中丞英义、李判官等人，叮嘱他们为国家利益而效尽良才。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这年八月，杜甫欲回羌村探望家属，肃宗也正希望杜甫离开，遂准假探亲。杜甫怀着恋阙与思亲的矛盾心情，迷茫地踏上了征途，向东北进发。途经麟游（今属陕西）时，观览了城西的九成宫，由这座隋代的建筑而念及前朝因奢致衰的往事，联系当今国家动乱的时局，不禁仰天长叹。途经宜君（今属陕西）时，观览了城西北的玉华宫，此宫是为太宗养病所建，宫室俭朴，他不禁怀念起太宗之俭德。经过六七百里路的艰辛跋涉，终于在秋季的一个黄昏抵达了羌村。亲人相见，如在梦中，邻里感叹，松泉悲泣。杜甫作《羌村三首》，以朴实的笔墨记录了乱世人情。稍后，又创作了五言长诗《北征》，记述自凤翔到羌村的沿途经历和到家后的情事，战乱中田园荒废惨像和民生的苦难悉入诗中，又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军事形势提出了个人见解，忧国忧民之情贯穿始终，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九月，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官军及回纥援军十五万，从凤翔出发，长驱东进，直逼长安，决战之势已成。杜甫在羌村闻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以昂扬奋发的激情预先为官军祝捷。十月，东西二京光复，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作《收京三

首》，却以沉着、冷静的笔触作痛定之思。十一月，杜甫携家属离开羌村返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官职。

两京收复后，君臣得以喘息。但时隔不久，肃宗便在宦官李辅国和皇后张良娣的挑唆下，开始排挤玄宗旧臣。乾元元年（758）春天，免去贾至中书舍人官职，出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五月，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贬太子少师房琯为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贬京兆尹严武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贬国子祭酒刘秩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刺史。杜甫因曾在凤翔疏救过房琯，被视为同党，亦被免除左拾遗官职，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主管地方文教事务。杜甫遭此打击，心情苍凉而且郁忿，在离京赴任走出金光门时，不禁想起去年四月曾冒生命危险从此门西逃投奔肃宗，如今忠臣反遭放逐，实难求得心理平衡；想到今后朝政之不容乐观，又不禁驻马徘徊，不忍离去。杜甫此次贬官，固然是仕途上的重大挫折，但对于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则是幸事。其一，从此他对肃宗朝政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加强了诗歌批判现实的力量；其二，他由皇帝身边走向基层，重新接触广阔的社会人生，从而能够取得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源泉。

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来到华州任上，在酷热的天气里埋头于案牍，颇觉难耐，每每发狂欲叫。华州东南六十里即是西岳华山，他作《望岳》诗，虽也表示要去“凌绝顶”，但目的已不是早年的“一览众山小”了，而是“高寻白帝问真源”，要向华山之神——“白帝”讨教人生的真谛。求仙访道，正是他遭到挫折之后的困惑表现。这年重阳节，他是在蓝田（今属陕西）崔氏庄友人处度过的，曾作诗抒发年老悲秋、人生短促的慨叹。冬末，他离开华州前往洛阳探望亲故，又去城东旧居陆浑庄，指望能见到战乱中离散的弟弟们，却未能如愿。环顾旧庐，但见满目荒凉而已。

乾元二年(759)二月,杜甫仍居洛阳。当时的军事形势堪称乐观,郭子仪等九个节度使合兵数十万,把安庆绪据守的邺城紧紧围住,眼看即可一鼓而下。杜甫作《洗兵马》,为夺取最后胜利而击节高歌。但是,由于军中未设主帅,致使攻城不力;加上史思明降而复叛,从河北引兵来解邺城之围。邺城之战竟以官军溃败而告终。郭子仪退保洛阳,他的部队原有万匹战马,只剩三千,甲仗十万几乎丢尽。为了补充兵员,唐政府实行毫无章法的拉兵政策,不分男女老少,见到就抓。时当三月,杜甫由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目击种种抓丁惨事,深为震惊,经过精心构思,写出组诗“三吏”、“三别”,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人民群众所遭兵役之苦。诗中跳动着作者的一颗痛苦而矛盾的心,一方面为人民的不幸而悲伤,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而不得不支持人民去做牺牲,忧国与忧民之情并行交织于作品中。

乾元二年(759)从春到夏,关中地区旱情严重,米价暴涨,饥民流亡。杜甫一则迫于生计,二则对昏庸的肃宗失去了信心,遂决计辞掉官职,远去秦州(今甘肃天水)求食。这年七月,他带领家属走上漫长的旅途。秦州距华州一千余里,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为西北重镇,东西交通之要冲,人事稠杂。杜甫到达秦州后,想在附近的山野找个安静的地方定居下来。他的族侄杜佐住在城东南六十里的东柯谷,听说族叔来到,便来城中拜访,并邀杜甫前往东柯谷居住。杜甫可能前往那里看过,终因没能找到合适的房宅而罢休。随后,又曾去西枝村勘察可供建宅的地基,也未能如愿,只好寄居于城中一所简陋的房屋。这期间,他虽身无官职,却没有忘怀国事。边塞上报警的烽火和悲凉的鼓角,时时写入他的诗篇。他预料吐蕃将成为唐王朝的边患,他批评肃宗一味依靠回纥援军来平息安史之乱,认为这样做会后患无穷,其后事实果如所言。这期间,他还创作了一批思弟忆友的诗

歌，无论长篇短制，都相当成功，乱离之叹回荡于字里行间。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杜甫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十月，秦州南面的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佳主人”来信相邀，杜甫遂携家离开秦州，踏上南行之路。二百多里的路程，山重水复，迂曲艰难。杜甫将沿途所历写成一组纪行诗，共十二首，真实地记录了每一步的艰辛，并每每由自己的不幸而想到战乱年代的百姓和士兵，连绵不休地唱着“穷年忧黎元”的主调。不料到了同谷以后，那位“佳主人”却未给杜甫提供生活援助。杜甫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生活深谷之中，他只得白头乱发的暮年之躯去天寒日暮的山谷捡拾橡栗充饥，以致手脚被冻得皴裂坏死。又曾扛着大镐去白雪覆盖的山野挖掘黄独（一种可食的土芋），每每空手而归。他抵达同谷当在十一月初，却于十二月一日被迫携家离开此地，南往成都寻找安身之处。这一路山水行程，险象环生，古老的秦岭、巴山栈道上，留下了他的声声叹息、曲曲悲歌。他把所历艰险又写成一组纪行诗，也是十二首。

十二月末的一天傍晚，杜甫一家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到了成都。在成都尹裴冕的关照下，暂时寓居于城西草堂寺。第二年（即上元元年，760）开春，便在西郊的浣花溪畔营建草堂，春末，草堂建成。从此，他有了安身之处，结束了半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定居初期，心情获得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草堂的北邻是个退休的县令，南邻是位隐士，其余皆是普通农家，杜甫与他们亲密交往，颇得良趣。成都一带古迹甚多，先主庙、武侯祠、司马相如的琴台、武担山的石镜等等，杜甫前往观览，皆留有诗作。然而，草堂生活毕竟是寄人篱下的，生活费用全靠友人的资助，一旦周济失时，饥饿便找上门来。“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可能是在埋怨在彭州（今四川彭县）作刺史的老友高适。这年秋天，高适由彭州刺史改任蜀州

(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曾前往蜀州会晤高适，想来也与生计问题相关。这一时期，忧国与思乡，感时与忆弟，也时而拨动他的心弦。

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段子璋反叛，自称梁王。五月，高适与新任成都尹崔光远合击段子璋，斩之。崔光远的部将花敬定乘平乱之机大肆掠民，作威作福，杜甫有诗讽之。十月，崔光远受朝廷责备，忧愧而死。十二月，朝廷派严武镇蜀。严武与杜甫为世交，二人又曾同朝为官，感情亲近，他的到来为杜甫的生活带来了保障。但仅过半年，又被朝廷召回。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六月，代宗召严武还朝以委重任。杜甫为失去身边好友而惆怅不已，一直将严武送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方依依告别，叮嘱他努力为国效忠。

杜甫在绵州逗留期间，成都军阀徐知道起兵造反。杜甫不能回归，浪迹于梓州一带。冬初之际，返回成都把家属由草堂接到梓州，客中作客，其情可想。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安史叛军被彻底消灭，消息传到梓州，杜甫惊喜万状，百感交集，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以记情怀。他想立即出峡回归故乡洛阳，却因财力所限，未能如愿，只好在梓州、阆州一带流浪。此时，吐蕃已成唐王朝的严重边患。这年七月，吐蕃进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代替严武作西川节度使的高适奉命于雪岭(又称西山)松、维、保三州设防，军事连连失利。杜甫深感忧虑，在所作《对雨》、《王命》、《征夫》等诗中，记录了战局的严重和巴蜀百姓的苦难岁月。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仓皇出逃，长安陷落，百姓惨遭杀戮。消息传来，杜甫万分痛心，作《巴山》、《遣忧》等诗以记时难。杜甫在阆州时，曾代阆州刺史向朝廷上表，论述巴蜀地位之重要，而目前深受吐蕃威胁，朝廷应立即选派贤明亲王前来坐镇，或派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大臣前来扭转战局。

此时西川节度使正是杜甫的友人高适，可见杜甫论事是从国家利益上着眼的，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广德二年（764）正月，朝廷派严武重来镇蜀。严武寄信给杜甫，邀他返回成都。杜甫遂改变出峡的计划，携带家属回到草堂。六月，严武向朝廷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任节度使署中参谋，朝廷准奏。杜甫遂来成都严武幕府供职，偕同操练军队，力图收复松、维、保三州。七月，严武举兵西征，杜甫作《东西两川说》一文交给严武，文中论及若干军略问题。九月，严武击败吐蕃七万兵马，攻克当狗城（四川理番县东南），十月又克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挫败了吐蕃气焰，西蜀局势得以稳定。杜甫在幕府供职期间，每与青年同僚意见不合，受到他们的嘲笑和排斥，感到实无必要周旋其间，遂决定辞去参谋官职，永泰元年（765）正月，终于获得严武的允许，重回草堂从事耕耘。

这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年仅四十），杜甫失去依靠，只得告别草堂，买舟出峡。先是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入长江，东行经渝州（今四川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至云安（今四川云阳）时，因病不能前行，这时已近中秋。直到大历元年（766）春末，方启程东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时，又因诸病缠身而滞留。杜甫在夔州居住近两年，而所作诗篇多达四百余首，约占今存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这些诗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一是写日常生活，如养鸡、种菜、经营果园、种植水稻等等。其二是写当地的风物和古迹，白盐山、赤甲山、滟滪堆以及险恶的瞿塘峡口等等，都被传神地表现出来；而武侯祠、先主庙、八阵图、白帝城等古迹之咏，每每织进国事与身世之叹。其三是写忧时与伤民，这是重要的部分，当时蜀地军阀崔旰之乱未靖，战乱给百姓带来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之苦，杜甫以真实而生动的笔墨记录了种种惨痛的现实。其四是忆旧篇什，内容有关于

国家的、个人的和亡友的。体会作者的用意，可能是感到年老多病，前景不长，趁夔州生活比较安定，及时把一生所历形诸文字，以期对后辈有所交代、有所警示。这部分作品是研究杜甫及其他诸人、研究安史乱后唐王朝所历厄运的绝好材料，许多方面弥补了史书的不足，值得珍视。这些作品主要有《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遣怀》、《昔游》、《壮游》、《八哀诗》及《秋兴八首》等。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收到弟弟杜观从江陵（今属湖北）寄来的书信，说已在当阳县（今属湖北）找好了住处，催他出峡。正月中旬，杜甫携家离开夔州，乘船东下，三月初，抵达江陵，把家属安置在当阳县。此时他仍任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故思北上归京，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江陵留滞数月，深感人情淡薄，故携家继续东下，途经公安（今属湖北）居留数月，于冬末抵达岳阳，沿途所见皆萧条的冬景和凋敝的民生，作《蚕谷行》和《岁晏行》以记楚地百姓在苛税下的悲惨遭遇。又于岳阳楼上登临眺望，写出忧时伤世、悲天怜己的五律哀歌。

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离开岳阳，乘船南下，经由洞庭入湘水上溯。三月，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停留数日，继续南行，欲往衡州（今湖南衡阳）投奔少年旧交今任衡州刺史的韦之晋，沿途但见农村荒废，民室空虚，不禁痛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抵达衡州后，方知韦之晋已在三月间改任潭州刺史，遂返回潭州，与韦相见。不料，四月间韦氏即病死，杜甫生活无依，曾向崔涣、卢十四两侍御求援，又在潭州渔市上摆设药摊，卖草药以糊口。

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在潭州造反，杜甫再次随百姓一起逃难。逃到衡州，收到舅氏崔伟（时任郴州录事参军）的邀请信，遂溯耒水前往郴州（今属湖南）。船至耒阳（今属湖南）县境的方田驿，遇江水暴涨，不得行进，停泊五天，断粮

绝食。耒阳县令聂某得知消息，派人送信问候，赠给食物。杜甫十分感激，作诗答谢。因水势不退，只得返程。此时臧玠之乱已平，杜甫欲由汉水北归京都，向湖南亲友请求资助，未能如愿，终因贫病交集，死在湘江船上。时为大历五年冬。他的最后一首诗是在船上伏枕写成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叹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只好停放在岳阳。四十三年之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将灵柩迁葬于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诗人生前念念不忘的归乡之愿，死后多年才得以实现。

中唐诗人元稹受杜嗣业之托，曾为杜甫写作墓志铭，说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此论曾于后世引起一场“李杜优劣”之争。有人扬杜抑李，有人扬李抑杜，也有人主张李杜二人不宜分优劣。我们认为，诚如有人所言李杜二人所持创作方法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故不宜分出高下；然而，若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若论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挚、对友谊的执着与珍视、对弱小之同情以及宁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诸多方面，杜甫则是当之无愧的千古诗坛第一人。而这些宝贵的思想、感情和品德，无疑是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这是杜甫何以能够赢得后代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为中国中世纪诗坛的唯一代表加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的重要原因。杜甫继承的是儒家思想传统，同时对儒家思想又有所批判。这种继承与批判的结果，是把个人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无论个人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则不管有无官职，总是在为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命运而思虑不已。儒家认为“上智下愚”，轻视劳